孔锋，魏福祥. 我国农村散养户非洲猪瘟疫情防控风险研究[J]. 灾害学，2022，37(3)：17 - 21. [KONG Feng and WEI Fuxiang. A Study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frican Swine Fever Among Rural Free - Range Farmers in China[J]. 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2022，37(3)：17 - 21. doi：10. 3969/j. issn. 1000 - 811X. 2022. 03. 004.]

我国农村散养户非洲猪瘟疫情防控风险研究*

孔 锋[1,2]，魏福祥[1]

（1.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2. 清华大学 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北京 100084）

摘 要：在非洲猪瘟对我国生猪产业产生巨大冲击的背景下，生猪生产恢复的相关扶持政策主要面向规模化养殖的企业集团，而对农村养殖户的关注较少。该文以行政村村委、兽医对农村散养户生猪养殖的管控和农村散养户自身的防控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对比非洲猪瘟疫情在国内的传播过程以及各级政府的防控政策，选取广西恭城县 A 村的防控现状进行实际调研，研究农村地区防控中的问题与对策。结果发现：①上级政府及其政策对规模化养殖关注和扶持较多，对农村散养关注较少；②农村疫情防控力量薄弱；③村委在政策执行中存在惰性；④兽医本身履职能力不够，履职态度不端正；⑤农村养殖户信息获取不足。针对上述问题，该文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

关键词：非洲猪瘟；农村养殖户；应急管理；乡村治理；信息化平台

中图分类号：X43；X915. 5；S851. 3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 - 811X(2022)03 - 0017 - 05

doi：10. 3969/j. issn. 1000 - 811X. 2022. 03. 004

近年来，非洲猪瘟疫情的出现对生猪产业尤其是我国农村生猪养殖产生了重大影响[1]。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猪肉是城乡居民肉类膳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2]。一旦疫情防控失利，将对我国生猪生产和猪肉消费造成严重打击。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做好非洲猪瘟疫情防范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府相关部门对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的应对从 2007 年左右便已开始[3]。

2018 年 8 月 3 日我国确诊首例非洲猪瘟疫情，感染省份由东北逐渐扩散至南方，范围覆盖全国，给我国生猪养殖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尽管目前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全国范围内尚未根除，小范围、区域性的疫情时有发生[4]。散养、放养以及野猪是非洲猪瘟疫情难以控制的原因之一[5]。因此，缩减散养或放养，发展规模化舍饲并对猪舍加装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将有利于防控非洲猪瘟疫情。现阶段下农村散养户在我国生猪养殖主体结构中仍占有较大比重[6]。部分地区农村散养生猪也是农民增加收入来源、农村本地猪肉市场供应的重要途径之一，关乎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7]。另外由于目前尚无有效的疫苗和药物可以用于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治，对该病的防控主要依赖于加强检疫和监测，防止疫病侵入，一旦发生只能采取扑杀净化的措施，以实现未发生地区的安全防疫和发生地区的完全根除[8]。规模化养殖在检疫和监测方面具有集成化管理的优势，而农村散养户由于养殖数量少、所处地域散，在集中检疫监测上恰恰处于薄弱地位[9]。因此，在规模化养殖趋势下，做好当下过渡阶段的农村散养地区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控工作至关重要。

农村地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的直接对象包括农村地区的生猪养殖、调运、屠宰、入市等环节。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参与主体主要有行政村村委、兽医、乡镇畜牧兽医站等政府公共部门和农村散养户、生猪经纪人、屠宰场等市场主体，而农村地区非洲猪瘟的源头在于农村散养户。因此，本研究以行政村村委、兽医对农村散养户生猪养殖的管控和农村散养户自身的防控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对比非洲猪瘟疫情在国内的传播过程以及各级政府相应的防控政策，结合对广西恭城县 A 村防控现状的实际调研，发现在农村地区的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从而为相关部门做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提供可能的参考。

1 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的发生特征及关注焦点

2018 年 8 月 3 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发生一起生猪非洲猪瘟疫情，这是我国首次发生非

* 收稿日期：2021 - 12 - 01 修回日期：2022 - 03 - 23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港澳台重点专项项目(2018YFE0109600)；北京市社科基金研究基地项目(19JDGLA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21TC062).

第一作者简介：孔锋(1986 -)，男，汉族，山西临汾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生物安全、气候变化风险与自然灾害研究.

E - mail：kongfeng0824@ foxmail. com

洲猪瘟疫情，随即农业农村部发布非洲猪瘟Ⅱ级疫情预警[3]。随后，非洲猪瘟疫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2018 年 8—12 月间，全国涉及 21 个省份，共发生 99 起疫情，扑杀生猪 80 万头，最高峰时一个月发生 20 多起。2019 年 2 月 19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两个养殖小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两个养殖小区共存栏生猪 2.35 万头，发病 1629 头，死亡 924 头。这是自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全国第 106 起疫情，也是广西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2019 年我国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63 起，其中家猪 60 起，野猪 3 起，扑杀生猪 39 万头。2020 年，我国共发生 19 起非洲猪瘟疫情，累计扑杀生猪 1.4 万头。2021 年我国非洲猪瘟疫情呈现多省份零星散发态势，生猪产能基本恢复，猪价重回近几年的低位，但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形势仍然十分复杂和严峻，国外疫情现状不容乐观[1]。

我国非洲猪瘟疫情在 2018 年 8 月首次发生后，迅速扩散至 21 个省份，2019 年逐渐得到控制，2020 年逐步恢复生猪产能，2021 年生猪市场供应和价格恢复疫情前正常水平。广西非洲猪瘟疫情在 2019 年 2 月首次发生，并在 3 月、5 月、7 月出现了贵港市、玉林市相邻地区先后发生疫情的情况。在非洲猪瘟疫情传播与防控过程中存在部分的实际报告与客观发生有时间滞后的情况。2018 年 11 月农业农村部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个别畜牧兽医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职甚至严重失职、渎职的现象，造成疫情处置不及时、跨区域传播等严重后果。因此，农业农村部特别制定印发了《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八条禁令》[7]。非洲猪瘟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肆虐对我国生猪养殖、市场供应、居民消费造成了重大影响。

在生猪养殖上，由于目前面对非洲猪瘟疫情采取的措施大多是扑杀和无害化处理，这对我国的生猪养殖造成了重大影响，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 万亿元[6]。学界普遍认为此次疫情将会加速生猪散养户的退出，生猪养殖主体结构将会加速向规模化调整[1-3]。从已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来看，小规模猪场、散户中招占多数，主要原因是小猪场生物安全措施相对薄弱，而规模猪场在猪场隔离、饲料安全、防疫等方面要更有优势，抗疫情风险能力较高[8]。同时也存在保持散养户的声音。规模化养殖由于体量巨大，一旦感染，损失不可估量。但目前学术界对于生猪养殖规模大小的等级划分还没有统一标准。

2 不同层级政府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中的政策和措施

2.1 中央政府层面

我国中央政府统筹全局，对非洲猪瘟疫情警惕性高，提前意识强。2012 年 11 月，农业部联合相关部门发布《关于切实做好非洲猪瘟防范工作的通知》[10]，要求对非洲猪瘟疫情做好防控措施。2014 年，农业部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先后在北京联合举办“中国非洲猪瘟防范项目启动会”和“非洲猪瘟防控政策磋商会”，共同研究推动中国非洲猪瘟防范工作。2015 年 9 月，农业部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全国非洲猪瘟防控应急演练，11 月印发《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试行)》[11]。2017 年，针对距我国较近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州发生得非洲猪瘟疫情，农业部于 4 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风险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12]，9 月印发《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13]。2018 年 11 月，农业农村部制定印发了《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八条禁令》[7,14]。2021 年 4 月印发《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15]，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开展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工作。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层面对非洲猪瘟疫情是高度重视的[4]。

2.2 地方政府层面

本文主要分析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和嘉会镇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1)广西壮族自治区。2019 年 2 月 19 日，广西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当日，广西政府在南宁召开全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紧急视频会。2019 年 6 月 3 日，广西政府再次召开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对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要进一步强化生猪跨省调运监管、疫情监测排查、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措施落实，所有调入调出广西的生猪必须接受检查。2020 年 11 月，广西开始全面禁止非中南区的生猪(种猪、仔猪除外)调入，中南区内原则上不进行生猪(种猪、仔猪除外)跨省(区)调运。

(2)桂林市。2018 年 11 月 30 日，桂林市人民政府印发《桂林市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实施方案》[16]。2019 年 1 月 29 日桂林各县(市、区)组织力量对生猪养殖场(户)、生猪交易市场、屠宰场等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2019 年 2 月 19 日，广西全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紧急视频会召开后，桂林市当天继续召开会议，对当前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评估、再部署，明确了稳定生猪生产、保障肉食品市场供应具体要求。

(3)恭城瑶族自治县。2019 年 7 月 29 日，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恭城瑶族自治县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指挥部。2020 年 7 月，恭城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印发《2020 年恭城瑶族自治县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17]，内含非洲猪瘟疫情监测计划。

(4)嘉会镇。2018 年 9 月 4 日，嘉会镇人民政府印发的《嘉会镇 2018 年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18]中，尚未出现非洲猪瘟疫情防控要求。随后 2019 年春季和秋季、2020 年春季和秋季、2021 年春季相继发布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19]中，均增加了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并始终对传统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工作要求坚持“政府保免疫密度，业务部门保免疫质量”工作制度。

3 嘉会镇 A 村的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的实地调研分析

3.1 A 村生猪养殖业概况

A 村所在行政村一共包括 4 个自然村，防控工作均由村委主任和一名兽医负责，至今未发生过非洲猪瘟疫情。A 村现有生猪养殖户均非全职养猪，均为农业种植和养猪兼顾。养殖规模上，养猪数量均在 10～30 头左右浮动。养猪业在农户的

收入来源上占有重要的作用。且主要利用门前屋后的空余房屋或简易搭棚作为养殖场所，利用空闲土地种植青草饲料，利用餐厨剩饭、所种青草饲料来补充猪饲料，养殖成本相对较低较灵活，因而正常情况下单位收益较好，且不像农业种植那样受天气、气候原因影响收成，具有相对稳定的产出，所以对农户来说，养猪业是一种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可以增强农业收入的稳定性。

3.2　非洲猪瘟疫情及相关政策对农村养殖户的影响

(1)对种猪购买的影响。在生猪调运政策限制和非洲猪瘟传播风险的影响下，农村养殖户趋向于在本县范围内购买种猪，直接向亲友熟人购买或者经其介绍牵线向陌生人购买。他们相信这样在一层社会关系的庇佑下，能避免买到卖家因猪存在短期难以发现的某些隐性问题而急于出售的种猪，或者买家因“不识猪”而买到以次充优的种猪品种。其次，养殖户更愿意向地处较偏僻的山村、养殖规模很小的养殖散户购买种猪，他们认为“小地方更干净安全，没得过猪瘟，大猪场怕沾到病毒”。

(2)对生猪饲养的影响。在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及相关政策要求禁止使用泔水喂猪、加强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后，农村养殖户在生猪饲养的饲料和饲养场所方面均无变化。饲养饲料上，主要包括青草饲料、餐厨剩饭、酒糟(酿酒后残渣)、专业猪饲料。其中，青草饲料以红薯植株的茎叶为主，常种植在门前屋后的菜地里或者较远的果园地里。农户普遍认为增加了青草饲料的猪长得肉质比较好。泔水以自家餐厨剩饭为主，政府发布的防控政策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泔水喂猪，原因是泔水中含有不明来源的猪肉相关制品而携带非洲猪瘟病毒，曾因此发生数起非洲猪瘟疫情。但有所区别的是，大型养殖场所使用的泔水往往来源于附近学校、餐馆等公共场所的餐厨剩饭，而散养农户所使用的泔水主要是自家一日三餐之后的餐厨剩饭，他们认为“自己吃的(饭菜)没事”，农户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饭菜的原料来源，且以自家种的蔬菜为主，从市场上买来的猪肉即使有残余也不会拿来喂猪。酒糟主要是酿酒的农户利用酿酒后的残渣添加的养猪饲料，当地向来拥有这种“酿酒 + 养猪”的匹配式的农业生产模式。专业猪饲料需从市场上购买，平时饲养会添加一部分专业猪饲料，不会全部使用专业猪饲料，因为购买成本较高。在饲养场所上，以门前屋后的闲置农房或者搭建的简易铁棚房为主。这种非专业养猪场不具备生物安全防护措施，没有专业的粪污处理装置，以人工用铲子清理、用水龙头冲洗为主。粪便一般露天堆积在养猪场旁边，定期运输到田地里进行还田沤肥。

(3)对肉猪交易的影响。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下，相关部门对肉猪交易的报批要求加严，农村养殖户自身报批意识也增强，害怕在所售肉猪出现问题后因未报批而受罚。农户出售肉猪时，需要向村委会报告签字，同时跟随买家去乡镇畜牧兽医站签字，登记身份信息、售卖数量、运输车辆信息等。如果卖家未签字，买家不能获得免疫证，所购肉猪便不能进入屠宰场屠宰和入市销售。

3.3　A 村相关主体对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控

(1)村级兽医。A 村村级兽医只有一名，负责 A 村及其他三个自然村所有的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在非洲猪瘟疫情期间充当防疫员，负责非洲猪瘟疫情的监测、报告和应急处置。据养殖户反映，以前兽医每年会定期来一两次家里，给各家各户的鸡鸭猪牛接种相关疫苗，这与乡镇每年发布的两次春季、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19]相吻合。但近几年，兽医履职情况不佳。一是兽医技术水平不高，甚至不如养殖多年的农户熟练，农户存在不信任兽医技术水平的现象，拒绝兽医给自家牲畜打针接种疫苗。二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19]中虽明确规定“各村要分片包干、扎实通知到户，村干部要带领防疫员上门，确保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畜(禽)、畜(禽)不漏针、针不漏效。”进行强制接种，兽医来到养殖户执行工作时变成了让农户自愿接种，但不管农户愿不愿意接种，只要签字确认即可。兽医自身存在政策执行打折扣，变相执行的现象。

(2)农村养殖户。农村养殖户对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控可以分为养殖户自主防控和群体联合防控。在养殖户自主防控方面，一是养殖户限制自身活动轨迹，切断传播途径。非洲猪瘟疫情期间，A 村养殖户均有意识地减少了进出乡镇猪肉市场的活动，并在接触过猪肉市场回来后，会洗澡换衣服再进入猪场。二是进行疫苗接种和药物投喂，增强易感猪群的抵抗力。疫苗接种方面，目前尚无非洲猪瘟疫苗，接种内容主要是传统猪瘟疫苗。接种方式主要是养殖户自行接种或请生猪养殖大户接种，很少让兽医接种。除上述新任兽医技术水平不高和变相执行政策的原因外，还因为养殖户害怕兽医在不同养殖户之间使用公用针管接种易引起病菌感染，某养殖户在请生猪养殖大户来接种时特意询问了是否是使用一次性针管。以及因为生猪在接种疫苗之后往往出现连续几天进食减少的现象，养殖户认为这几天生猪免疫力会下降，容易感染其他病菌以及增肥变得缓慢，而不轻易选择接种疫苗。三是进行养殖场所的病毒消杀工作。针对猪场，养殖户采用消毒水喷洒和铺洒生石灰消毒为主。在群体联合防控方面，以封堵排查外来生猪及猪肉入村和入县路口为主。村级范围内养殖户联合排查入村路口。当地农村存在猪肉下乡贩卖的小商小贩，开车进入各个村庄贩卖。一些村庄的养殖户自发组织对村入口检查拦截猪肉下乡商贩，禁止猪肉进村。

(3)村委。村委主任主要负责非洲猪瘟宣传工作，以及配合兽医开展入户监测工作，监督兽医履职情况。近年来，肉牛养殖保险普及至农村，村委主任负责入户采集肉牛养殖户信息，进行登记并投保。针对生猪养殖的保险投保目前还没有。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期间，A 村养殖户未接收过来自村委关于非洲猪瘟防控的宣传资料和通知。

4　非洲猪瘟疫情农村防控中的典型问题

(1)上级政府政策对农村散养关注较少。上级政府及其政策对规模化养殖关注和扶持较多，对农村散养关注较少。在农业农村部 2019 年发布的《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中，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农机购置补贴、养殖用地审批、财政奖励支持、金融保险支持等生猪生产扶持主要面向规模化养殖场。并规定了各省

区生产恢复目标和产销平衡要求，广西被纳入生猪及产品调出区，要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作出贡献，实现稳产增产。在稳产增产任务压力下，桂林市政府大力扶持大企业的生猪养殖事业，力争完成全年生猪年存栏、出栏的目标任务而对乡镇、农村基层防控和农村散养户生猪生产扶持较少。农村散养户养殖规模过小、地域分散，难以统一监测和管理，不会成为完成稳产稳增任务的发力点。

(2)农村疫情防控力量薄弱。根据各乡镇非洲猪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安排，平均一个乡镇及其所辖农村的防控力量为该乡镇的畜牧兽医站站长、副站长、一名站员和各村的村委主任、一名村级防疫员(兽医)。面对全乡镇的鸡、鸭、猪、牛等动物疫病的防控，上述防空力量则较为薄弱。在非洲猪瘟特殊时期，农村养殖户选择自发组织防控工作，开展入村入县路口排查，维护自身养殖利益。

(3)村委在政策执行中存在惰性。调研时农户表示，“村委有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曾经乡政府下拨少量水泥，村委懒得去拉回来，因为拉回来后还要决定用在哪儿，还得组织人施工，很麻烦，不如不要，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这侧面反映出村委存在一定惰性。此外，A 村地处偏远，历年来尚未发生过动物相关疫情，此次非洲猪瘟附近的发生点也距离较远，对本村的防控存在侥幸心理。上级政府及时制定发布的防控宣传资料和规定，村委未如实进行传达和宣传。

(4)兽医履职情况不佳。一是兽医本身履职能力不够。因技术水平欠佳，难以获得养殖户信任而得不到养殖户的工作配合。二是履职态度不端正。存在“只签字不打疫苗”，变强制接种为自愿接种等变相执行政策的问题。原因在于一方面兽医是本村村民，同时兼顾自身农业生产和兽医工作，兽医工作所得不足以完全支撑生活开支。另一方面，兽医工作中存在较大顾虑，兽医自身业务能力的不足和养殖户的不配合，共同促成了履职上的折扣现象。

(5)农村养殖户信息获取不足。访谈过程中，养殖户均表示非洲猪瘟疫情是在 2019 年 4 月才变得严重，对疫情形势的严重程度的感知存在偏差。一是由于村委未及时进行宣传，二是舆情在当地出现疫情之后才变得严重。养殖户信息来源主要是当地亲朋好友和同行之间的交流，以及手机抖音、快手平台的本地推送，养殖户信息获取范围有限，不会主动上网搜索疫情相关信息，难以提前知晓疫情在外地的发生情况从而提前预防。

5 提升非洲猪瘟疫情农村防控对策建议

(1)加强基层防控力量。一方面对原有力量进行加强。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兽医技术培训，增强履职能力；二是完善农村基层兽医工作待遇和环境，促进工作投入和落实；三是建立兽医执医过程中的保险制度，消除兽医工作顾虑。另一方面纳入社会力量进行补充。一是考虑纳入全县生猪养殖户这一市场群体作为常态防控力量，通过政府引导促进建立县域生猪养殖行业协会或者应急管理小组，引导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养殖技术培训、疫病防控宣传等工作，发挥养殖户主体能动性。二是支持养殖大户、养殖能手在疫病接种治疗的经验积累基础上，开展社会化市场化兽医服务，为其提供相关资质培训及认定。

(2)加强政策执行监管。加强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建立针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执行过程的反馈、监督和管理。当地贫困户扶贫慰问工作中，帮扶工作人员在送达慰问后需拍照记录并上传至统一管理平台，接受监督和考评。在非洲猪瘟疫情农村防控工作中也可以参考这类做法，增强过程中的监管。而不仅仅是疫情防控工作的结果中出现生猪死亡等不良情况才进行问责，避免“不出事就没事”的情况。

(3)增强农村养殖户信息来源。从调研情况看，农村养殖户对于非洲猪瘟疫情的重视程度、反应灵敏性、防控意识是比较强的。但这种防控意识是相对而言的，农村养殖户在县域范围内的信息交流相对灵通，但非洲猪瘟这种全球性广泛传染的流行病疫，等到县域范围内出现相关情况再由农户知晓，已经为时过晚。因此，需加强农村养殖户信息来源，以提高农户对疫情了解的提前性和对防控知识的直观性。一是加强政府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农村村委的防控信息传达。二是相关部门可以利用农村农民经常使用的抖音、快手平台建立相关官方账号，进行防控知识宣传、防控视频传播；三是增强农户自身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和能力。在日常村级活动中或者兽医行医过程中，增强对农户合理利用手机网络平台及时获取疫情防控信息的能力。

(4)增加农村防控社会化服务。一是覆盖农村地区养殖保险。目前，企业规模化养殖已有对能繁母猪等重点猪群的保险业务，农村地区肉牛养殖也有了相应保险。进一步扩大保险覆盖范围，为农村地区生猪养殖散户投保，增强养殖信心和抗风险能力。二是引入兽医专业学生实习或大学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引导大学生利用实习或社会实践下到农村基层向农村养殖户开展技术服务或防控宣传工作。

(5)建立全国动物疫病防控信息一体化平台。对特殊领域的全国统一防控有很多先例。日本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研究洪涝干旱预警风险评估和管理，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灾害预报与信息传递系统。韩国则设立中央灾害对策本部，专门负责发布全国范围内的灾害信息和警报。我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流通的频繁，全国统一布局、地区联合防控成为重大疫情发生时的必要选择。2019 年以后，互联网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贫困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数字鸿沟”加快弥合，同时，移动流量资费大幅下降，居民入网门槛进一步降低，信息交流效率得到提升——农民通过网络关注热点事件成为现实。在动物疫病防控领域，以非洲猪瘟疫情防控为契机，建立防控信息一体化手机 APP 平台，纳入政府相关部门、兽医、养殖主体等相关主体入驻平台，提供动物疫病防控信息公开、交易流通过程监管、防控工作执行监督等功能服务。利用信息化优势将中央政府防控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养殖户手中，同时收集养殖户养殖情况数据，便于相关部门统计监测。这将会减少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

提高政府统一管理动物疫病的成效。

6　小结

为探究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我国农村养殖户防控中的主要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不同层级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之后基于实地调研的结果分析了农村生猪养殖中的问题：上级政府政策对农村散养关注较少、农村疫情防控力量薄弱、村委在政策执行中存在惰性、兽医履职情况不佳和农村养殖户信息获取不足。为此，本文认为非洲猪瘟疫情下农村地区的防控应重视以下问题：重视政策法规的末端执行，进行监督和反馈。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重视信息技术的使用，信息化平台的建设。本文通过政策梳理和实地调研，对比分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的差异，了解到农村地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中相关主体行为背后的考虑，为改进对策提供了一手资料支撑。

参考文献：

[1] LU Y, DENG X J, CHEN J H, et al. Risk analysis of African swine fever in Poland based on spatio – temporal pattern and Latin hypercube sampling, 2014 – 2017[J]. BMC Veterinary Research, 2019, 15(1): 135 – 143.

[2] LIM J, KIM E, RYU P D, et al.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of African swine fever in wild boars (Susscrofa) and its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in South Korea. [J]. Journal of Veterinary Science, 2021, 22(5): 3342 – 3356.

[3] 岳学全. 非洲猪瘟防控策略分析[J]. 畜禽业, 2021, 32(11): 37 – 38.

[4] 刘丽蓉, 王文杰, 孙明, 等. 非洲猪瘟防控专题档案规范化管理[J]. 中国动物检疫, 2021, 38(11): 60 – 63.

[5] 代振江, 李达, 冯文武, 等. 非洲猪瘟防控策略[J]. 猪业科学, 2021, 38(10): 49 – 51.

[6] 卫秀余, 吴文辉, 顾晓, 等. 非洲猪瘟防控的经验和误区[J]. 猪业科学, 2021, 38(10): 53 – 54.

[7] 农业部. 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八条禁令[EB/OL]. (2017 – 09 – 20)[2021 – 05 – 01]. http://www.moa.gov.cn/gk/tzgg_1/tz/201811/t20181121_6163388.htm.

[8] 韩磊. 基于网络舆情的农村突发事件挖掘与分析[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0.

[9] 石国宁, 张涛, 王无为. 中国非洲猪瘟疫情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3): 137 – 142.

[10] 农业部. 关于切实做好非洲猪瘟防范工作的通知[EB/OL]. (2012 – 11 – 02)[2021 – 05 – 01]. https://www.waizi.org.cn/law/18224.html.

[11] 农业部. 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试行)[EB/OL]. (2015 – 11 – 24)[2021 – 05 – 01]. http://www.moa.gov.cn/nybgb/2015/shierqi/201712/t20171219_6104138.htm.

[12] 农业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风险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EB/OL]. (2017 – 04 – 12)[2021 – 05 – 01].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XMYS/201704/t20170412_5557878.htm.

[13] 农业部. 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EB/OL]. (2017 – 09 – 20)[2021 – 05 – 01]. http://www.moa.gov.cn/nybgb/2017/dsq/201802/t20180201_6136188.htm.

[14] 邓朝贵. 非洲猪瘟疫情防控难点及有效应对建议[J]. 畜禽业, 2021, 32(10): 96, 98.

[15] 农业部. 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EB/OL]. (2021 – 04 – 21)[2021 – 05 – 01].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xmsyj/202104/t20210421_6366333.htm.

[16] 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桂林市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实施方案[EB/OL]. (2018 – 11 – 30)[2021 – 05 – 01]. https://www.guilin.gov.cn/zfxxgk/fdzdgknr/jcxxgk/zcwj/202005/t20200521_1810794.shtml.

[17] 恭城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0 年恭城瑶族自治县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R]. 恭城: 恭城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0.

[18] 嘉会镇人民政府. 嘉会镇 2018 年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R]. 恭城: 嘉会镇人民政府, 2018.

[19] 嘉会镇人民政府.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R]. 恭城: 嘉会镇人民政府, 2021.

[20] 农业部. 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EB/OL]. (2019 – 12 – 04)[2021 – 05 – 01]. http://www.moa.gov.cn/gk/zcfg/qnhnzc/201912/t20191206_6332872.htm.

A Study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frican Swine Fever Among Rural Free – Range Farmers in China

KONG Feng[1,2] and WEI Fuxiang[1]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Center for Crisis Management Research*,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huge impact of African swine fever on China's hog industry, the relevant support policies for hog production recovery are mainly oriented to enterprise groups with large – scale farming, while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o rural farmer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 committees and veterinarians on rural free – range pig breeding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ural free – range farmers themselves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By combing and comparing the process of the spread of African swine fever in China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village A of Gongcheng County, Guangxi was selected for actual research to study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rural area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 Superior governments and their policies pay more attention and support to large – scale farming and less to rural free – range farming; (2) rural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ces are weak; (3) village committees are inert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4) veterinarians themselves are not competent enough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and have an improper attitude in performing their duties; and (5) rural farmers have insufficient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problems, the paper proposes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Key words: African swine fever; rural farmers; emergency management; rural governance; informatization platform